

现在

与 12 位媒介人的对话

○杨君【著】

还你一个真实的影视世界
二十一世纪媒介人内心写照

At present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与十二位媒介人的对话/杨君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

ISBN 7-301-04428-3

I. 现… II. 杨… III. 传播媒介-文化事业-概况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439 号

书 名: 现在:与十二位媒介人的对话

著作责任者: 杨 君

责任编辑: 马辛民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428-3/G·055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1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听电视人说说心里话(代序一)

□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 黄望南

认识杨君同志是在 1991 年，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老友叶家铮教授有一次专门给我打电话，请我做他的开弟子电视系研究生杨君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原因是她选择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毕业论文课题——电视技术与电视艺术的关系。我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的研究室工作，我们也进行一些电视理论课题的研究，其中包括电视技术和电视传媒的关系。

杨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谦虚好学、很有礼貌的青年学生。她非常细致和耐心，意志力强。当时有关电视技术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著述和文章非常少，可以说她的这个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她翻阅了大量的有关电视特性、电影特性、电视制作与电视技术的书籍，目的是找到一些在影像技术和艺术结合部上的共同规律。

她的勤奋很有成果，1992年她为此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开设了一门《电视节目制作的艺术》的课程，在本科生和大专班中讲授，她第一次尝试站在一个综合学科的高度上将一些由于电视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电视语言和电视表现方法演进的过程进行归纳和总结。开始时她是一个文静的教师，课讲得非常学生气，但却很受听课者的欢迎，原因是她开启了许多初学者关于电视创造性思维的新思路。同时我认为讲课的过程是一个整理思路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她那时说为了备好课常常需要找大量的资料，请教很多专业人士，写下不少笔记和提纲。

由于讲的课广受欢迎，记得有一段时期，电视系的老师们集体出去讲课，总愿意排杨君这位小教师的课表，她讲的课虽然文气，但角度很独特。比如我参加过的一次前往山西省电视台的讲课就有高鑫老师、任远老师、叶凤英老师和杨君等等。她的授课时间一直持续到1993年来台工作以后。

由于她从事研究课题的独到性，1993年夏天，山东电视台专题部策划了一部系统表现电视传媒的系列节目《电视艺术欣赏》（50集），特地请她撰写开篇第一、二集的解说词。这部由广播电视系统专业人士参与制作的系列专题播出后收到较好的反响。

杨君的毕业论文最后定题为《电视技术的发展与电视传播观念的变革》，她试图阐述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电视语言的沿革和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还记得她经常来研究室向我们的其他两位老同志请教，一位是曾做过总编室主任的赵群，他现在已经过世了，由于突发的情况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位是臧树青同志，他多年来一直做电视

纪录片的研究工作。有时候我们也会找些题目请杨君合写文章和做一些专题片撰稿人的工作，她都非常准时和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对于我们对她论文的修改和建议，她都非常虚心地加以吸纳。

杨君是一位比较仁厚的同志，她愿意帮助别人，而对于帮助过她的人她也总是心存感激。让我记忆深刻和感动的一件事是：为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对她的帮助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她毕业来台工作发第一个月工资，拿到自己挣来的第一份辛苦费的当天，她打电话来非常诚恳地请我们三位老同志去台内吃一顿便饭，以谢老师们多年来对她的栽培和帮助。虽然饭食简单，但她对老师的尊重和恭敬给我们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她对自己的同学和师兄们也非常关照，广播学院的许多学生也都是她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杨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得到了包括朱羽君教授在内的很多业内人士的赞赏，并且由于选题的前瞻性和对电视特性以及电视语言发展分析的透彻深入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在94年《电视研究》上摘登后，接连在1994、1995年度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论文三等奖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学术论文基础理论的一等奖，并在多家专业刊物书籍上转载，也由于这篇文章她成为1996年上海电视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年龄最小的专业报告人。

杨君是一个实干类型的同志，她进入中央电视台后，总是会把自己拍摄的新作拿来让我们提意见，对于大家对她节目和图像的意见看法她虚心地听取并不断改进。她是一位很有上进心和很有思想的专业电视人，我认为她的成长并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她不骄

傲、不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对自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记得有一次我给学生们讲课说到，人生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境界，一种是为了活着，没有追求；一种是为别人活着，有很多虚浮的东西；还有一种是自然地为自己活着，简单而朴素，但很清醒。杨君记住了这句话，我知道她要做第三种境界中的人。

一本好书是一个朋友，听电视人说说心里话可能会得到另外的对人生的看法，不失为一种角度。

闲言碎语，是为序。

黄望南

1999 年 11 月

电视是一个梦想(代序二)

□上海东方电视台 田安莉

电视是一个梦想。

电视是让世界实现诺言的一个梦想。电视还是我们所有执着的电视人心中唯美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心力和辛劳。为了这个梦想我们舍弃了太多的选择、普通人对生活的期待甚至健康。

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从事电视记者两年后认识了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女孩，在她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选择了电视，那时她刚刚完成大学生向一个年轻的电视专业研究生的转变。她聪慧、理智、自制力强并且充满理想；同时她单纯、诚恳、无忧无虑，对一切充满了良好的希望。她健康乐观的心态非常感染人，她的名字叫杨君。我们的友谊十年不变。

那一天我采访归来，同事把一个剪着

短发的小姑娘介绍给我，同时我得知她是北京广播学院当年以文科总分最高分录取的电视系研究生。由于特殊原因，那一年广播学院很多老师不招生，她是当时考上的为数很少的女孩子，师从叶家铮教授，是导师的开门弟子。这次是来利用入学前的暑假实习。我不由得开始认真注视这个女孩子，她很文静含蓄地站在那里，看上去就像个大二、大三的学生，丝毫没有张扬的感觉，没想到这个涵养很好的女孩子还很不简单。那是1989年的夏天，在沈阳电视台新闻部。

我们都非常欣赏并喜欢这个幸运的小姑娘，她仿佛如一个邻家女孩儿一般单纯自然。实习期满，大家舍不得她离去，纷纷在与她离别的日记本上写句话，记得我写道：“在电视这条路上女孩子面前并非永远是鲜花和掌声，愿你坚持和努力。”当时的她礼貌地道谢，并不太理解我这位长她十岁的大姐的心里话。我看着她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我的从前。

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且多年的友谊不变。在她回去念研究生的日子里，我们还常通信，互相交流思想，互相鼓励。我非常喜欢读她的信，很坦诚，同时文笔非常优美。后来，随着她电视事业的深入，她告诉我，她终于开始理解我多年前写给她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但是随着这位年轻人成长和对她的了解，我开始钦佩她的耐力和意志。她是我见到的那种为一个信念而努力的优秀的女孩子。这个信念就是做一个好的电视人。

如果说电视是我多年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梦想，那么在我的可以称为忘年的朋友杨君身上我看到了这个美好的梦想。

1994年的冬天,我再一次见到了一两年没见的杨君,此时她已研究生毕业,加盟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当时她正跟随一个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几家新闻单位组成的记者团采访环渤海地区,她带着一个摄制组赶来沈阳。依旧是一头短发,依旧是时而沉静稳重时而活泼的样子,但她的系列报道却极有力度,常常让人刮目相看。

1994年我的生活面临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是否放弃我多年在沈阳的努力,为了父母和孩子,回到上海。当时有很多人劝我留下,还记得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杨君支持我回到上海,理由很简单,就是应该回到父母身边。她的观点是亲人是我们事业前进的动力,另外上海对于电视人来讲是一个更高的起点。后来我考虑了她的建议,在将近四十岁时在上海东方电视台重新做一名新闻打工者。

后来我就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见到她的名字或着她书卷气很浓的形象。然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再见到杨君时是我已到了上海东方电视台以后。那天接到她的电话,很高兴也很是意外,但更意外的是见面后她告诉我她是来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的,组委会邀请她在电视节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她的一篇获奖论文。说这话时,杨君的语气淡淡的,没有丝毫的炫耀。但我知道,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宣读论文或做学术报告的都是各国电视行业里的知名人士,并且都极有资历,而杨君那一年才二十多岁,是那一届上海电视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最年轻的一位“学者”。

还有一年我进京采访“两会”,任务完成后我与她迈进

她家门。一进屋，我就被随意堆在地上、桌子上的书籍、报刊、杂志的数量之多惊呆了，我如何也没有想到她的业余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她喜欢各种古典音乐，读英文小说，也整日与文字为伴。她的墙上还贴满了各种各样写满小字和笔记的小条，她这些年来写下的日记就有十几大本，“一日三省吾身”，她让我感动、感慨不已。

认识杨君已整整十年了，我们的年龄也整整相差十岁，应该算是两代人。奇怪的是我们似乎没有年龄上的界限，倒是这个女孩子常常让我生出敬佩之感。她是一个不功利也不势利的人，不随波逐流，不见异思迁，她重友谊、崇尚智慧、也崇尚实干家。每一年她都做了不少事，每一年她都读了不少书，每一年她都有很大的进步，她鼓励我不停地学习和思考。最让我钦佩的是她耐得住寂寞做学问，做为一个职业电视人来讲，她能够统筹安排自己的时间学习新东西，她不断实践的同时又能沉下来安静地读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很多女孩子，她们大都很可爱，有些毕业以后就成了我的同事。她们都很聪明，但有时会觉得缺少点什么。有很长时间我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杨君，并且看到她的成长。她是我见的不多的能够沉下来学习新东西的电视人。

我看过杨君主持的节目，印象中她与说问题谈思想的节目联系在一起很自如，记得有一年的世界环境日节目，她专访了很多环境方面的权威人士，那是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看到的最早的高视点关注环境的好节目。她做主持人时的气质非常好，职业女性干练睿智，自信，反应快，具有稳健沉静的大台风范。我始终认为她的定位应该是做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深度报道的主持人。她有了八年的采访实践和屏幕经验,好读书的个性又使她始终站在电视理论的前沿,这些积累会使她的主持变得厚重、丰满而令人信服。

这本书反映的是电视人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中国电视的几十年来的发展里程。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的过去已成为过去,抓住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就是抓住希望。

电视是一个梦想,愿我们好梦成真。

田安莉

1999年10月

电视人的怀念(自序一)

请田安莉为我的书作序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可能这个愿望源于五六年前,而在我毕业十周年时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深感欣慰。

认识田安莉还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是在1989年8月。那时候她三十出头,而我二十出头,她整整大我十岁。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前到沈阳电视台新闻部实习。那以后,我们成了可以说心里话的好朋友,并且十年的友谊不变。

1989年2月,经过两年的充分备考,吃了新闻系、国际新闻系、电视系和语文部许多老师专为我开的无数的补习“小灶”,除了我的本专业外,记忆了相关专业至少一百本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终于如愿已偿实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我以当年广播学院文科类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电视系(当时还叫电视系),成为当时系里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那一

年我 21 岁。

这对于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和当时学电视工程的我和电视系来讲,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毕竟这样的事情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学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对于 19 岁的我来讲 1987 年春天进入这次备考无异于参加一次超负荷的杂技比赛。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们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情,而真做起来就要困难的多了。只不过做的人要显得轻松。而我多次选择了这种貌似举重若轻的事情。比如电视这种职业、再比如不断地参加各种考试。

在我的记忆中能够参加 1989 年 2 月(大年初三)的研究生考试简直就是训练杂技中的“高空扔瓶”技巧。还是在孩童的时候祖母就注意到我非常喜欢看电视中的杂技节目,我对那个能将六只瓶子轮番扔上天而不会掉下来摔碎的人是羡慕有加。而我真正尝试了这次“扔瓶子”考试才知道,那是一个多要工夫的事情,我手中的“瓶子”必须分毫不差地落在我的手上,而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扔出其他的瓶子,才能保持我的节目不至于中途砸锅。

而要维持这种技术关键还需要极其的细心。记得我有两年的时间,日程表是以分钟计算的。科学教会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掌握方法,方法得当容易成功。我基本采用的是淘汰法、统筹法、突击法和排除干扰法。这样我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淘汰法建立在我的远期大计划的制定上。我把需要复习和学习的课程列在纸上,我当时发现从广播学院教务处找来的文科课表(新闻系、文编系、国际新闻系、电视系)四年基础课和专业课总课程数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以一门课

两本教材来算，我必须在两天内读完一本书并将主要要点内容记在卡片上。我以一个月淘汰消化十二本书的速度推进，用毛泽东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精神淘汰那些看过的东西。

而统筹法是一个在书本中学习到的工作方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说人体的记忆和健康周期每个人不同，有人在早晨效率最高，有人在中午状态最好，所以要把每天自己最好的智力和体力时间段用来做最难的事情。我清楚地估计了我必须要做的和可能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完成我当时的电视工程学士学位，因为那是我的主修，比如我必须要每天去教室听课，完成作业，参加考试，最好还能在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同时我必须要做的事是我是班里的干部，为了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我要承担一些公共的责任。在这基础上我的业余时间是我自己可以分配的。

于是我使用了课堂集中法，在本专业课上高度集中精力听讲，在课堂上将当天所讲的内容全部消化，并将当天的作业完成。一下课马上将思维换到我复习的内容上去。

而最让我受益非浅的是我的“突击法”。我在几个集中的时间段中猛攻英语和政治。比如在临考前半年，我每天吃完晚饭要做的就是一件，记忆英语，这样可以不会由于其他学科的介入忘记词汇。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一本《风暴式英语词汇记忆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记忆的单词量在几百个以上，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良好记忆力，因为它帮助我不厌其烦地记忆了上下两册的《牛津英汉词典》。为了不受外界嘈杂环境的影响，从那时开始我看书喜欢戴耳机听音乐，这样会让我更专心致志。同时更引发了我日后对

古典音乐的热爱。

以上“四法”和北京广播学院诸位老师的大力帮助让我一次考试成功。这简直就像参加一次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

记得在当时有人讲,电视系的研究生是千里挑一,而女孩子学电视系的研究生比例更少一点。此话一点也不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研究生屈指可数,并且都是本专业的有过实践经验的优秀分子。那时候招生的确非常严格。除了专业课考试面积广泛外(新闻理论、广播新闻业务、文学、古汉语、逻辑、历史、政治、新闻英语、电视专业业务),关键是必须要有实践经验,要会扛摄像机拍片子。文化课考试笔试结束后,还有一个有多位老师联席出题的复试。能够满足这样苛刻条件的人和愿意接受这样苛刻条件的人有限。

当然我已有的师兄师姐们都是让我骄傲的精英。

现在在电视界比较有名气的袁正明,他是电视系的大师兄,目前是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主任,是《新闻调查》和《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

另外像刘书亮、沙颖、郑浩、陈晓卿和高晓红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现在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刘书亮毕业留校,在广播学院教了多年的导演造型课,他上课风趣有号召力、才华横溢。他参与拍摄过多部电视剧,做过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摄像和导演,在学校时他借过不少好书给我。

沙颖是一个很内秀的人,在贵州电视台时他为了事业不顾危险漂过长江,拍回很多经典镜头。他爱好画画儿,字也写得很漂亮,在校时我们同为叶老师抄过几十万字的书

稿(那时候还不习惯用电脑)。他为人相当谦虚。后来他同教外语的妻子一起去了日本,据说做了 NHK 的主摄像。

郑浩是一个乐观、有一点天才的人,他为人宽厚,富有创造力。现在他的东方星雨传播公司做了不少优秀的电视 MTV。

我来到电视系的时候陈晓卿已经毕业分配到 CCTV 工作了,所以不熟悉,但经常听人提起他的名字,后来听说他有不少节目获得了国际电视节的大奖。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电视系的。当时我面对着新的较大的压力。

当时唯一的一位女性高晓红是一位能扛摄像机的女性,单就这一点已让我钦佩不已。高晓红也比我年长十岁,是一个善良敬业的女士,我称呼她为师姐和高老师,她对我十分照顾。我们分在同一个学生支部,支部书记是刘书舫老师。高晓红是目前电视界最早研究广告的人,并出了不少本专著,对中国电视广告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优秀的学生都是朱羽君老师的学生。或许当时是一个小女孩的原因,我对自己学电视扛摄像机并不自信。但是可能从小我由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喜欢文史,能够背诵不少《历代诗歌选》中的名篇,学习语言的悟性也很不错,文化课成绩是佼佼者这点应该没跑,所以电视虽然对当时的我来讲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意味着我将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从头做起,我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长处在于思考和电视化的表达,弱点在于动手能力。而这对于当时对自己认识极其客观和清醒的我来讲,不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回忆起当初考研研究生的契机,总觉得人生很有戏剧性。

时代在前进,社会知识层次的提高也是这样。现在获得硕士学位在岗位上应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若干年前却并非如是。

在1985年,我们这批学生在科学的春天中走进琅琅读书声中的校园时,读书的气氛的确很浓,那时候社会上各种哲学新思想书籍很多,读一点尼采、萨特哲学和王朝闻的西方美学在学生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本科毕业后考研究生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尤其是电视系的研究生。作为一名学电视工程专业的女孩子来讲,跳科考试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我还有本专业电视工程的课目需要完成和毕业。而促成我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1987年的元旦,那个新年我们家中的诸多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大学、研究生生涯和当年的奋斗精神。我非常崇拜他们的成绩。

于是全家人帮我分析考虑考试方向应该集中在我的长项。比如,我的记忆力相当好,我学习语言的悟性很高,我英语的底子好,所以去考国际新闻系(英语系)就比较容易成功,除了英语、政治和专业课以外,其他比较容易准备。后来我去找了当时英语系可以带研究生的金老师,他给我很多的建议和帮助,介绍给我各种参考书和学习方法,以及历年的英语试题集。很可惜的是1989年那一年英语系没有招生指标。

老人们说,中国人历来都是两条腿走路,所以多一种准备成功的把握性就更大些。于是我开始将目光投向电视系。开始我的信心不足。1987年初,我大学二年级,在一次电视艺术选修课后,我试图与讲摄影欣赏的朱羽君老师交谈(当时的广播学院电视专业分为工程部和电视文科部,还